

聚焦全国两会



把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众手中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只有把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众手中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后,政府在落实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上的最新表述。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如通过实施“三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多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对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加快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步伐,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仍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被打破,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资本,管理的收入分配比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影响百姓生活和社会和谐,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阐明了发展与人民的关系,并且在推动“和谐社会共建共享”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仍需要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将逐步到位。

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出了处理好分配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要求,而且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把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众手中,是对政府工作的新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新华社记者 周英峰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相关链接

“我建议,国家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让大家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荆晋,继在上海两会上提出这个提案之后,再一次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这个令全国人民都为之瞩目的提案。(曹辑)



释永信代表:传统文化要成为国家软实力组成部分



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记者王飞、常璐)“人大代表是一种职务,当然就要肩负责任。”已经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语气坚定地说。

1981年,释永信来到嵩山少林寺出家,礼方丈行正长老为师,俗名刘应成的他法名永信。朝拜印度、尼泊尔佛教圣迹,远赴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从1990年开始,释永信成为一个穿梭于各国的“特殊人物”,而这一切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弘扬少林文化”。

在国内,少林寺网站显示了释永信的“工作清单”:1994年2月,创立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1995年9月,策划、筹备并主持“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庆典法会”大型活动;1996年5月,创办《禅露》杂志;1999年初,创立少林文化研究所;1999年8月,荣升少林寺方丈。

在释永信看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如果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政策没有前瞻性,这种冲击产生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释永信说,“少林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现在最关心国家的宗教政策。”

释永信希望所有热爱少林文化的人都能来少林寺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少林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30年五次改革: 折射行政管理体制走向



新一轮的改革已经启动,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让人们充满期待。(资料图片)



前不久,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至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从目标到实施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小,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需要。

5次改革一条主线: 精兵简政 转变职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一直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转变职能、提高效率。

1982年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多达100个,领导职数急剧增加。汪玉凯说:“当时冶金工业部,正副部长一共有24位。”此次机构裁减,国务院撤并了39个部门。

回头看1982年的改革,其成功点不仅在于精兵简政。这次改革的深远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二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

当1988年推动第二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国改革的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尽管由于后来复杂的原因,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但其历史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直到现在,仍然是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

1993年的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如果说过去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到1992年终于“摸”到了这块“石头”,即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的“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次政府改革始于1998年。这次改革精简力度很大,改革前国务院有40个组成部委,结果减少了11个。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外,这次改革将其他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都撤消了。同时,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机构,提出公务人员要减一半,国务院当时3.4万人减了1.7万人。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即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5次改革一种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梳理5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提出来的,不是空穴来风。反过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汪玉凯分析说,1982年进行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即经济性质仍然是计划经济。到1988年进行第二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加了诸多限制,但经济性质已变成商品经济了。到1993年推动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很显然,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了三次大突破。相应的,行政体制要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比起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艰难性表现为: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格

局的重新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步到位。1982年的机构改革,几乎是一次数量增减性的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1988年,中央就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1993年更进一步提出行政体制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则适应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同时为深化国企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清除了体制障碍。很显然,每一次改革都不是过去的重复,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改革链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但是,2003年的非典给人们当头一棒。人们深切感受到经济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

5次改革一个启示: 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十一五”规划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迟福林分析说,我国已从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与30年前相比,新阶段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两大矛盾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

一些专家指出,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明确提出要用集约式的增长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长,十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哪个县长、市长的底线,都是本地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拼资源、拼环境。

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政府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这个转型应是两大任务: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到一个公共治理型政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宋振远、张建新(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我省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建议

在洋浦实行国际船舶登记制

本报北京3月9日电(特派记者黄晓华)中资国际海运船舶大量悬挂方便旗,有损我国航运大国的地位和形象。我省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以海南洋浦保税港区的设立为契机,实行国际船舶保税登记,吸引中资方便旗船舶回归。

提案说,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统计,我国国际海运船队悬挂外国“方便旗”经营已达到总吨位的56%,而在境内登记、悬挂五星红旗的船舶占总吨位的44%。其原因在于船舶为规避船舶高额的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获得境外方便和优惠的融资条件等。

提案指出,国际上是按挂旗吨位来决定航运大国排序的,大量中资船舶悬挂方便旗,不但使五星红旗船队的总吨位下降,而且由于其中含有不少技术先进的新船,使我国五星红旗船队产生结构性问题。这无疑有损我国航运大国的地位和形象,影响国际海运市场竞争力。

委员们建议,以海南洋浦保税港区的设立为契机,实行国际船舶保税登记,设立中资方便旗船舶保税登记机构和制度,以吸引我国现行的从事国际海

运的中资方便旗船舶回归登记。在保税登记期间,船舶可以暂缓缴纳进口船舶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可以也只能悬挂五星红旗从事国际海运活动,而一旦该船舶要转入国内海运航线,则仍须按章缴纳船舶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样可以在提升我国海运船队的国际竞争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提案认为,洋浦保税港区实现了保税区与港口的合二为一,将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与港口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基本上具备对从事国际海运的中资方便旗船舶实行回归保税登记的时机和条件。

相关链接

目前船舶登记制度可以分为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三种。船舶所有人在实行开放登记的国家注册,取得该国国籍,并悬挂该国国旗,该国国旗称为方便旗,这些船舶称为“方便旗船”。目前,世界上提供方便旗的国家有:利比里亚、巴拿马、塞浦路斯、索马里、马耳他、新加坡、摩洛哥、塞拉利昂、圣马力诺、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黎巴嫩、马绍尔等。

迟福林委员建议—— 在海南建立首个国家环保特区



本报北京3月9日电(特派记者黄晓华)“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带风光和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它最有条件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我省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交提案,呼吁在海南建立国家环保特区。

海南面临很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迟福林说,1999年,海南省人大通过《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使生态省建设规划在海南生态环境建设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但从实践看,由于各种原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较为严重,生态环境压力很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提速,一些资源将难以维系,环境问题会更加突出。

迟福林认为,为了使海南真正起到生态示范省的作用,迫切需要研究生态示范省建设面临的文化、观念、公众意识、政策、体制、机制、企业行为、政府行为、生态建设关键地区民众生产生活需

要等约束,采取非常规的政策和体制安排,保证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的顺利实施。他由此建议,在海南建立国家第一个环境保护特区,以为海南生态省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并为全国积极探索经验。

要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

迟福林解释说,所谓环保特区,是划定一个特定的区域(一般是指一个水循环流域或者一个岛屿地区),采取严格的环保措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天然林、海防林、海岸带、海水、沙滩等,运用世界上先进的治理环境技术和治理机制,治理各种污染,采用严格、科学、有效的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工农业生产和从事经济运行、城市管理的特定区域。同时运用市场的手段对一定流域内的水源、空气、排污、固体废弃物协调管理,综合整治,使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个特定区域,执行较其他地区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节水、节能标准,以及更加关注于环境的保护、整治。

建设环保特区意义重大

迟福林认为,建立海南环保特区,对海南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发挥海南的资源优势,使海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有利于发展旅游,实现海南旅游的升级转型,使海南成为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国际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有利于发展海南绿色农业,进一步保持海南无公害的绿色农业及无疫区的优势地位;有利于发展海南新型工业,既有利于合理规划、布局新型工业,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吕薇代表为海南发展支招

大胆尝试体制机制创新

本报北京3月9日电(特派记者陈成智 译丽琳)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代表在许多经济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今天下午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她对未来海南寻求创新之路、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为海南支了几招。

吕薇认为,我们现在讲的创新这个概念有技术创新、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等等。对海南来说,更多的创新应该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从技术创新层面讲,海南可以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的产业,引进新的技术也是一种创新,引进技术以后根据本地的特点进行适应性改造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特色农业技术方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资源特点进行创新。

在深港合作论坛,吕薇曾提到深圳作为一个特区,应该在体制、机制方面带头敢闯敢试,她认为海南也应这样。因为随着全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过去的优惠政策优势已经逐步消失,比方我们连外商的税收都开始和内陆企业的税收接轨,因此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特区的试

点。吕薇说,仔细分析看,海南又确实和深圳不太一样,因为深圳开放得早,腹地比较大,和香港很接近,在改革开放上步伐比海南要快一些。但海南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在深化开放机制方面做一些大胆的尝试。比方说洋浦保税港区去年已经落户海南,实际上这就等于给了海南一个免税的加工区,下一步可以争取更加开放的旅游政策。

吕薇认为,这几年海南经济增长很快,但当前要注意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海岛文化给海南发展带来的一些影响。因为目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财、物都在流动,什么地方的投资环境好,经济、文化、体制的环境好,人才资金就会向这个地方流动,海南要用更开放的眼光来对待外资和人才的流入。关键是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继续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吸引人才和投资。



分析,特别是对经济立法要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

针对现在许多学生在毕业前一年就开始为找工作四处奔波,而不能安心学习的情况,李建保代表建议,全国人大应制定一个“大中专学生就业时机和方式”的法规,以保证教学质量。

吴昌元、符桂花、姜斯宪、王守初、郝如玉、王雄、陈国诚、邓泽永、王积权等代表也分别发言。

半个世纪的人大代表生涯 ——专访一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这是2008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驻地阅读关于两会的报道。



这是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申纪兰代表在报到。

仅从外表看,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位手上生满老茧、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是全国唯一参加过一至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被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活化石”的申纪兰。

见到申纪兰时,她正坐在桌前阅读政府工作报告。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穿一身藏青色衣服和一双黑布鞋,79岁的申纪兰仍像平时一样朴素。从25岁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现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申纪兰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我第一次参加人代会是骑着毛驴从村里出发的”,申纪兰回忆起当年的情况。1954年9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劳动模范申纪兰,从家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出发,先骑毛驴,然后转乘卡车、火车,走进了中南海的怀仁堂。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忐忑不安,到如今的从容,50多年过去了,申纪兰担任过两届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已记不清自己到底提过多少个建议和议案。

还有司法公正和惩治腐败。当年,申纪兰识不了几个字。而现在,她不但能通读报纸,看新闻,而且在人代会上常常与他人一起提出议案,行使代表权利的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现在我们国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每一天都有变化。大有大进步,小有小进步,没有不进步。”半个世纪的人大代表生涯使申纪兰感慨颇多。她说,这是她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心里话。新华社记者高风、黄敬文、王建华报道

